

■新作聚焦

余红长篇小说《洞庭人家》：

让文学重新接上“地气”

□袁硕望

余红长篇小说《洞庭人家》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叙事主角，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，还原洞庭湖区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炽热情感。作品展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洞庭小镇的历史变迁，塑造出“洞庭人家”的人物群像，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。

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历程

劳动者的主体性彰显是《洞庭人家》重要特征之一，作品字里行间散发出人民性的光芒。《洞庭人家》的可贵之处是将普通劳动者作为书写和歌吟对象，让劳动者站在叙事的中央。作者将生动的笔触伸入芬芳的泥土之中，让普通劳动者进入时代的宏大叙事，他们的悲欢折射了时代的沧桑变迁，是中国社会变革在洞庭湖区的一个缩影。

从余红的烟火叙事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、深情和礼赞。《洞庭人家》为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画像，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如历经磨难三次创业、兼具军人的果决与企业家的谋略、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改革者宋明泽；以一手好厨艺将家庭作坊发展为全国知名的“宋记”企业，被乡邻尊为“八仙妈”的许玉珍；在荷塘深处架起电商基站，用手机直播卖蟹的“90后”村官；在追捕还湖政策下转型生态护渔员的普通渔民，以及古道热肠、积极向上的街坊邻居、湖区居民……这些洞庭人家的普通劳动者共同构成了“湖乡泽国”洞庭小镇乡村变革的主体力量。

他们的喜怒与哀乐、奋斗与坚守、起落与沉浮都被细致描摹和郑重书写，既练就了洞庭湖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长卷，更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鲜活注脚，让读者在普通人的故事里触摸到时代的脉搏，在烟火气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。这种扎根大地的书写，让文学重新接上了“地气”。

深入日常生活叙事

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融入日常生活书写，是《洞庭人家》的又一重要特征。小说中的改革叙事与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密不可分，湖乡风情的图画深处弥漫着浓郁的湘风楚韵。宋明泽与曹晓娅讨论“如何盘活洞庭镇”的时候，他们热议的话题是经济意义上的乡村振兴，也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创新。许玉珍厨房里飘出的酱板鸭咸香，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，也是地方风味的物质载体，这种叙事策略使作品充满人性的温度与生活的质感。

《洞庭人家》情感伦理的深度开掘凸显了小说人物的人性之美。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既有青春的悸动，又有理想的共鸣。曹晓娅与宋明泽的恋情之所以能开花结果，除了彼此从小相识相知、日久生情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曹晓娅是宋明泽干事创业、报效家乡的理想共鸣者、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。小说中的亲情叙事暗含了精神传承。父亲宋长江与宋明泽、母亲许玉珍与宋明泽、儿子曹云帆与宋明泽等，宋家三代人虽因代际不同而有许多认识和观念上的分歧，但善良正直、勤劳质朴、坚韧执着、团结和谐、热爱家乡、



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家风始终代代相传。

在追捕还湖的生态修复过程中，渔民从抗拒、迷茫到主动转型的心路历程，展现出普通人在历史转折中的精神韧性。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，亲手将渔船叠成“大龙船”纪念碑，这一举动是对传统的告别和对新生的拥抱，充满了人性的温暖。劳动者在时代变迁中并非被动承受者，而是以主体姿态参与创造着自己的命运，他们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。《洞庭人家》注重以日常生活细节展现社会变革，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人性之美。

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

在《洞庭人家》中，余红以人类学的细致笔触和田野调查式的方法，尝试复原行将消逝的洞庭湖区生活图景，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。小说鲜活呈现了渔民的生活和民俗文化，如渔歌号子的节奏韵律、“宝古佬”船的制造技艺等风俗事象，豆皮制作的秘方火候、铺子里挂满的风干鱼和“鱼垃圾”做成的八仙辣鱼酱等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，还有“世上有三苦——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”“水退洲上住，水涨船为家”“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一艘船便是全部家当”等湖区生产生活习俗，共同编织成洞庭文化的基因图谱。作品以“血肉相连”

《洞庭人家》绘就了洞庭湖

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长卷，成

为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鲜活注

脚。作品彰显了劳动者的主体

性特征，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融

入日常书写，以田野调查的方

式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，为现

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留存了一份

鲜活的精神档案和一段深刻的

文化记忆

的创作视角，使地域风俗成为“呼吸般自然的存在”。“晒月亮”的麋鹿与跃出水面的江豚在月光下共舞，自然风物也被赋予了楚文化特有的浪漫诗性，激活了深植于湖湘大地的文化符码。渔民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大湖记忆和文化乡愁，告别心心念念的过往，迎接新时代新生活的细节描写，更令人动容和动情。龙舟竞渡场景的描写，不仅是湖区民俗的集中展演，更是湘楚地区民众凝聚乡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仪式。

对乡土中国集体记忆的文

学重构，使《洞庭人家》超越

了个人家族史范畴，为现代化

进程中的乡村留存了一份鲜活

的精神档案和一段深刻的文

化记忆。余红自觉地“让人民

成为作品的主角”，用现实主义

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

生活，书写了一部洞庭湖区的

文化志。

（作者系岳阳市文艺评论

家协会副主席）

■创作谈

我从小生活在洞庭湖畔，是看着这湖水长大的，水天一色，舟船鸥鸟点缀。一幅充满烟火气的水乡画卷。这片土地给了我观察世界的立足点，是我看待人生的根据地，我的成长与家乡的发展变化相依相随。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后，身边人各种故事融进我的记忆，汇入我的感受，洞庭湖水也给了我创作灵感。

我从事文学写作多年，一直没有脱离过沸腾的现实生活，所写的作品也多是现实题材。《琥珀城》《从未走远》等，都是基于自己的体验与感受的艺术再创造，是现实生活给予的宝贵馈赠。

创作《洞庭人家》的5年时间里，我多次深入洞庭湖区采访，进行田野调查，不仅采访了100多位渔民，了解了他们三代以上的湖区居住史，还观察候鸟迁徙，调查湖区重大生态事件始末等，积累了大量一手创作素材。小说中的许玉珍寄寓了我深厚的情感。许玉珍总是散发着柔和可亲的母性光辉，在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。每次写到深情处我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母亲的身影。母亲过世以后，我还是经常回老家住上一段。回到老家我才知道，我所念的不是故乡，而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——父母都在，一家人围坐其乐融融，灯火可亲。这部小说就是写“家”的故事，写给所有正在为家国努力追梦的人们。作品取名《洞庭人家》，我想由宋家三代人的奋斗志，呈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代演变，展现湖区百姓从小家到大家再到国家强大兴盛的进程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倾注其中，洞庭湖在小说中既是地理位置，更是湖区文化符号。我想通过芦苇荡、渔歌号子、鱼卷子等地域风物，不仅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更展示代际更迭对社会转型轨迹的映射，再现湖湘之地的自然底蕴。

许玉珍的儿子、小说的灵魂人物宋明泽的成长就像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宋明泽的父亲宋长江，这位用脚步丈量洞庭深浅的老巡湖人，不幸在抗洪抢险中牺牲，最终将生命融入湖水的褶皱，恰如传统渔业文明的悲壮谢幕。宋明泽自部队转业返乡后，从一位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成长为民营企业家人生轨迹，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经济的野蛮生长——他创办饲料厂时赊购千头猪仔的胆识，以乡镇养殖企业大胆合并肉联厂的气魄，到90年代末开发“洞潭王府”地产项目时的商业嗅觉，无不浸染着市场经济初潮的奔放气息。小说以洞庭湖生态变迁为隐性叙事主线，构建起宋家三代人“围湖一护湖—人湖共生”的生态演进轨迹。

在搞建设才是硬道理的大背景下，洞庭湖畔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带烟囱的企业与厂矿，产生的污染全部涌向了洞庭湖。2018年岳阳开启“守护一江碧水”至今，湖区人在洞庭湖畔掀起了一场上下齐心、脱胎换骨的绿色革命；坚持构筑生态屏障，通过“腾笼换鸟”，港口码头专项整治，以法治改善环境质量，破解“化工围江”。标本兼治之下，沿湖污染企业、厂矿或退出或搬迁，全部得到解决。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在洞庭湖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那段时间我就住在岳阳，现场采访了很多搬迁业主，他们经过思想斗争，最终还是想通了“人给水让路，水给人出路”的道理，认识到保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。2021年1月1日零时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“十年禁渔”，洞庭湖有了“喘息”的空间，长江岸线终于重获生机。起初我就想写一部家乡变迁的小说，初稿完成后，我在投稿会上听到了几位老师

的宝贵建议，整理修改意见后，再次回到老家岳阳继续打磨作品，期间多次走访湖区渔民，成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的一名志愿者。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，我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巡湖、守湖，不断思考如何把这部小说写透。我提醒自己：文学需要深入生活，需要倾听与思考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社会，应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。我想通过宋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，书写一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地方志。从宋家第一代以许玉珍为代表的传统匠人精神，到宋明泽体现的改革突围意识，至宋明泽的双胞胎儿子云峰、云帆一代的科技创新型实践，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，作品是想探索与发现新时代乡土中国的新面貌。现在的岳阳是中国最美的生态城市，是观鸟之都、旅游胜地，当《洞庭人家》的灯火点亮湖岸，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宋家三代人的创业史，更是洞庭湖人走向新时代的生态画卷。



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
GREAT CHANGES OF MOUNTAIN AREAS LITERARY PLAN FOR A NEW ERA

■短 评

怀果实之心，绘生长画卷

——读心盈纪实作品《生长》

□王继颖

2017年，雄安新区设立伊始，作家心盈便将目光聚焦于此，持续关注并发掘这片热土上涌现的各类人物典型。她与建设者们共同见证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忠实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拔节生长。

新近出版的纪实作品《生长》中，作者描绘了容城县政法委工作人员的身影：他们帮村民抢收小麦、播种玉米，抡起大锤平整路面；为高考的寒门学子奔走争取助学金，替唇腭裂儿童联系救助治疗；冒雨攀上贫困户的屋顶铺盖雨布、压紧砖头……这些基层工作者，以一件件“暖心事”默默践行着使命，如同摆渡人，“将村庄摆渡到雄安站、容东片区、雄安郊野公园，将群众从农房摆渡到租住房，再从租住房摆渡到安置房”。书中还定格了众多动人的身影：97岁的乡村剪纸艺人孙秀芹，一生创作剪纸无数；周龙山、贺友顺等湿地守护者，用镜头凝聚白洋淀的“飞鸟集”；水质监测员刘冬梅，三十年如一日为白洋淀切“脉”问“诊”，无畏水上冰上之险，坚持采样监测……

在助力雄安发展的磅礴队伍中，心盈着墨最多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。来自河北正定的资深园林人武芳芳，从项目落地到破土动工，与工人同甘共苦，像呵护孩子般深爱着负责建设的悦容公园。她直至预产期前夜才驱车返乡，产后仅两月便重返工地；来自北京的袁辰梦在雄安宣武医院建设期间突发腿疾，术后一周便拄拐坐轮椅，穿梭于工地上；更有无数朴实憨厚的工人，日夜坚守，力保工期。《幸福一座城》《橘井引泉人》等七篇

作品，深情叙写了这些建设者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，铭刻下他们为新区挥洒的汗水与艰辛——他们是“最可爱的雄安人”。

作品的篇目与内容，处处照应书名“生长”。《那一抹中国红》《白洋淀上的“水医生”》等篇章，聚焦雄安建设的中坚力量；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种云记》《黄湾濠秀》等，则多维度展现新区的蓬勃图景：蓝图上的建筑拔地而起，建设者的子女茁壮成长，校园体育事业欣欣向荣，连白洋淀凌波而起的飞鸟之翼，都印证着白洋淀生态的持续向好。读者虽很少在《生长》中直接得见作家身影，却又处处可感受到她注入字里行间的真情。作者——铭记那些默默奉献、体谅他人的平凡建设者的名字，娓娓道来一件件他们感人的平凡小事。正是通过这些普通人与普通事，雄安大地的生态发展变迁，得以生动、具象地铺陈开来。

新书分享会上，心盈曾援引诗句：“一朵花是否只要有了果实的心，就变得眼含热泪又无所畏惧。”她诠释道，这颗果实的心，既是自然万物的生机，亦是人间大地上蒸腾着的热气。深爱雄安故土的心盈，怀着一颗丰硕的“果实之心”，将文字之根深扎于雄安厚重悠远的历史与欣欣向荣的当下。诚如她笔下的感悟：“祖国大地是一幅长卷，先贤曾挥毫泼墨，而今，新的墨色已渲染开来。”她以勤奋为笔，执着为墨，不仅书写了雄安新区数十位典型人物，更透过他们，映现出背后数百万雄安人民与建设者的群像，为雄安的建设史留下了鲜活珍贵的文字记忆。

（作者系作家）

■新作快评

王昕朋中篇小说《侯二嫂进城》，《特区文学》2025年下半年刊第5期

主体观念、革命意志与民族精神

□曾 攀

抗战文学关乎民族精神的书写和塑造，一方面不得不触及宏大而崇高的层面，另一方面则需探向纵深繁复，以求真实与生动。因而其中一个重要模式，是描述正面战场背后的广阔社会图景。在聚焦广大民众的生活现场中，叙述不同个体情感的发展动向，将之置于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语境之中，追述总体性的革命意志的转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养成。

王昕朋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《侯二嫂进城》以台儿庄大捷为时间坐标，叙述徐州地区人民的抗日行迹，凸显了他们的生活图景以及精神状态。叙事者通过丰富复杂的生活细部写作，从人物具体而微的言行和观念出发，进入历史的深广处，在抗战敌后的宏阔腹地里，见证主体观念的变迁、革命意志的生成以及民族精神的淬炼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小说塑造人物活灵活现，耿大麻子是国军的团长，“以胜利者的姿态回侯寨，是想来捞一把的”，他随后接受日本人收编，当上了警备司令。小说还写了油滑油腻的中间派人物白大牙，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处长齐才，不断拓展抗战时期的人物谱系，也铺开了多样化的主体面相。齐才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，后来叛变，警备司令部潜伏的共产党被他所谋害。后来侯二嫂进城，在上级地下党组织的暗中指导和帮助下，与反人物斗智斗勇。

另一方面，小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塑造了汪政委与史先生的角色，即侯二嫂革命成长之路上的领导者和引导者。最后，通过策反其中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白大牙，将日本军官渡边和耿大麻子一网打尽。

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自然是侯二嫂。她为了完成共产党交给的任务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奔走于城乡之间，“她的任务是和那个未知的联系人接头，把情报转送出去，这是她来徐州唯一的任务，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不能出任何问题”。她最初只是一个战战兢兢、畏首畏尾，甚至有些贪生怕死的农村妇女形象，但在革命锻炼中经历了性格的转化和精神的蜕变。“侯二嫂一踏入寨子，双腿便不由自主地发抖发软。面对鬼子兵，韩老板率先跪下；侯二嫂也紧随其后跪倒在地。”随着战争的深入，她逐渐成长为大义凛然的革命者，服从组织安排，不畏牺牲，她前往徐州城接替已被捕的地下交通员，和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，也正面推动了局部战争的胜利进程。可以说，无数的侯二嫂们的英勇奋斗，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动力源泉。

侯二嫂进城的过程是空间的迁移及任务的设定，她身上体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抗战书写的主体变迁。很多个体都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完成了从普通民众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，艰巨的任务与革命的实践不仅塑造着人们的

情感结构，也为总体性的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的形成，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侯二嫂是抗战实践的个体缩影，也是现代中国的革命主体生成的样本，更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的高扬。在危难与危急之际，围绕着紧急任务的交付和达成，无数的普通民众成为可歌可泣的宏大叙事的“见证者”和“剧中人”。反观汪政委，他的身上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智慧，如不断鼓舞和激励侯二嫂，与敌人周旋，为革命做贡献；劝导侯二嫂和韩老板搞好关系，利用后者做抗日工作；策反白大牙，为剿灭渡边和耿大麻子奠定基础，等等。这样的形象在现当代中国的抗战书写中广泛存在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领导者形象。

王昕朋的小说截取了全民抗战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横断面，展现了民间抗战的现实场景，歌颂了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的倔强和顽强。这部作品是民族气节的具体写照，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正面战场，却通过更为生动鲜活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转变，展现出中国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大无畏精神。在和平年代，我们很难想象如此这般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决然，但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，在一次次文学叙事中，持续塑造着民族的筋骨和血脉。

（作者系《南方文坛》杂志副主编、编审）